

周庆安◎著

BEYOND VISIBLE BORDER

PUBLIC DIPLOMACY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超越有形疆界

全球传播中的公共外交

周庆安◎著

BEYOND VISIBLE BORDER

PUBLIC DIPLOMACY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超越有形疆界

全球传播中的公共外交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有形疆界：全球传播中的公共外交/周庆安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 1
ISBN 978-7-5657-2057-4

I. ①超… II. ①周… III. ①外交-研究-世界 IV. ①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0797 号

超越有形疆界：全球传播中的公共外交
CHAOYUE YOUXING JIANGJIE: QUANQIUCHUANBO ZHONG DE GONGGONGWAIJIAO

著 者 周庆安
策 划 编 辑 司马兰 姜颖昶
责 任 编 辑 姜颖昶 曾婧娴
排 版 楠竹文化
责 任 印 制 阳金洲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4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8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2057-4/D · 2057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代 序

全球化困境下的公共外交理论规制

从完成博士论文《冷战后美国公共外交传播模式研究》到这本书出版,已经十余年了。这十余年里,作为观察和研究公共外交的传播学者,我经历了公共外交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繁荣阶段,也经历了中国学术界认识公共外交、实践公共外交的历史进程。当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这十余年的时间,是公共外交在全球化跌宕起伏的大背景下曲折前行的十余年。作为研究者躬逢其时,也以此书作为小小的思考和记录。

全球化的困境

2005 年秋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文化论坛在约旦安曼近郊举行开幕式,主办方特意邀请了陕西何家营鼓乐社表演西安鼓乐,十余位关中老人用极有中国汉唐风韵的鼓乐,打破了死海之滨宁静的清晨。那是我第一次现场看西安鼓乐,而且是在丝绸之路的另一端。那是一次极为典型的文化杂糅之旅:既有汉唐鼓乐,又有罗马遗迹,还有千年死海边阿拉伯人的栉风沐雨,当然更重要的是东西方学者就公共外交的对话。

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样的会议并不罕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并且适应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的全球流动。尽管在 20 世纪后半叶,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9·11”事件的出现,全球对话的方式和内容都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全球流动的背后,仍然带来了更为广泛的全球对话。

几乎所有研究公共外交和软力量的学者,都会把目光投向 1991 年的苏联解体。弗朗西斯·福山用“历史的终结”来概括和描述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在今天看来,这种描述方式的确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制度优越感,但是也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传统的力量研究的方式在发生变化,在硬实力相对均

衡,核武器确保战争双方的摧毁能力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各国的软实力开始出现高低之分。因此,在对于冷战胜利的原因的解读中,软实力理论体系开始全面形成。

但是,2001年的“9·11”事件,则代表了冷战中一个未解的问题——为什么中东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反美主义情绪?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因为发展滞后,在全球化体系中被边缘化之外,西方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也并未转化为世界其他地区对其的认同和好感度。甚至在不少地区,宗教矛盾也因此凸显。极端主义不仅借助发展中的差异扩张自己的势力,同时也带动了另一种话语体系的出现。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自由市场和民主价值为代表的西方主流语境,并未在中东、非洲和拉美的部分地区开花结果。冷战结束后,这些地区反而成了全球传播和西方意识形态共同营造的真空地带。在部分国家的推动下,极端主义思潮和反美情绪在这些地区开始逐渐盛行,这一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后来全球化的困境。

当今全球化的困境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个困境是全球化参与主体的多元和资源垄断之间的矛盾,这里的资源垄断,绝不仅仅指物质资源垄断那么简单,更是指对资源的流动方式和经济规则的垄断。这就造成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源尽管可以自由流动,但是仍然有很强的单向性。在这种单向性的背景下,全球资源仍然在向着生产比较活跃、市场自由度比较高的地区流动,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资源的集中,换句话说就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资源集中的国家和地区拥有更强的垄断性,能够通过运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形成优势,从而使全球化呈现出资源一边倒的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金砖国家发展之后全球对于金砖体系的高度期待,实际上都是对全球化结构性矛盾的反抗。

全球化的第二个困境,是全球多元文化与单一表达方式之间的矛盾。当今世界由192个国家共同组成,这其中很多国家有着多元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的形成方式也不同,选择的发展道路也有所不同。尽管我们仍然承认,在这些道路的选择上,有一种人类共同追求的更加理性的文化表达路径,但是这种文化表达路径绝不是单一不变的。当前在全球文化的体系中,由于文化资源被高度垄断,文化的表达方式也出现了正确性的问题,这种正确性在国内体现出政治正确的态势,在国际上同样体现出国际性的政治正确。而全球多元文化也因此被划分了,甚至被人为制造出了对立、矛盾和冲突,并进而内化为真正的冲突。

全球化的第三个困境,是多种政治思想和一体化整合之间的矛盾。随着欧盟一体化数十年的历史进程,全世界日渐从这种模式中找到了更接近全球化的互联

互通的方式。也正因为如此,各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地让渡各方的主权,进而形成更加一体化的全球格局。在让渡的过程中,经济贸易合作与文化交流自然是能够取得共识的领域,但不同政治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与一体化之间如何进行整合,其实也成了不同国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尽管欧洲也在探索第三条道路,但是从难民危机之后欧洲内部的争论来看,其核心价值观往往还是会在压力之下让位于安全观核心。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和蔓延,这些困境进一步显现出来,并进而形成了一种对全球化整体趋势的争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传播作为全球化的一种思想力量,一直在扮演着推动全球化进程的角色。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源自西方的发展传播学路径。在这一路径的驱动下,国际传播构成了一种由边缘国家向中心地带演进的过程,现代化作为一种国际传播能够合作的观念,曾经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兴起。但是与全球化遭遇的困境相似的是,现代化的路径也比较单一。因此,当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和蔓延之后,不少人就将遇到的问题归咎于现代化和全球化,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也因此出现了新的挑战。

软力量的式微

因此,随着英国脱欧和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就职,传统全球化的路径遭遇了一次严峻的挑战。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阶段看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继冷战结束、“9·11”事件之后的第三起黑天鹅事件。与前两者不同的是,这个黑天鹅事件导致的社会分裂程度要远远大于前两者。这个阶段改写了当代政治传播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和理论框架。

我们其实有很多理由解释这些黑天鹅事件。比如在长达八年时间的经济低迷和反复过程中,美国民众的受损感一直没有得到修复,比如在近两年欧洲的难民危机中,欧洲价值体系核心的人道主义和欧洲中心意识不断受到冲击,再比如新媒体的崛起和不断爆料,让总统选举这个社会政治的核心活动变得越来越“狗血”。但其实从历史上看,特朗普不是空前绝后的第一人。说到大嘴,我们不妨回顾里根1980年参选时的出格言论,说到“狗血”,我们不妨回顾尼克松水门事件中的窃听风云,说到环境,我们也不妨回顾1968年的欧洲、北美,或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当然,新媒体崛起后短视的一代往往难以从历史中进行比较,但事实上这次选举暴露出来的问题也非常典型。

特朗普式民粹主义的崛起,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其时机和社会影响力。从时

机上看,民粹主义的崛起,根本上是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质疑,是政治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共同给民粹主义提供了一个自我封闭和排他性的理由。而这个理由的出现,既有基于理想主义的全球化在面对个体崩溃时的博弈,又有技术变革形成的经济社会转型困境。因此,就连知识分子出身的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也不得不把一部分政治遗产描述为亚太再平衡,而不全是充满争议的医保改革和经济振兴。而特朗普所呼应的社会质疑,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美国的政治谱系,使得下一位总统无论是谁,都必须向现实主义转变,这其实是观察美国未来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使得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的软实力理论出现了一个不得不修补的缺口。

客观上说,软实力理论是一个很脆弱的理论。之所以说它脆弱,不是因为这个理论没有起到作用,也不是因为这个理论缺乏范式,而是因为1991年约瑟夫·奈提出这个理论的时机不太合适。软实力理论之所以在1991年大行其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西方情报、决策机构和政治理论家们还没有准确判断的情况下,苏联解体了。这就迫使学术界需要找到一种解释体系,而软实力理论恰好能够为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提供一种解释原因,并且找到国际关系的历史脉络。

可是为什么软实力不能令美国和中东关系缓和,软实力为什么不能吸引极端主义势力改弦更张,软实力为什么没有给北非难民更持续的耐心?因为软实力本身是一种基于制度的哲学延伸,是一种制度性优势的文化描述。当制度面对各种冲击不得不进行修正和完善的时候,软实力势必会受到冲击,而维系软实力的一系列制度性议题也会面临被解构的可能。

2016年,软实力理论的确面对一种怯魅的历史冲击,从美剧《纸牌屋》中就能看到这种冲击在传媒文化中的兴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软实力扮演的角色不同。软实力理论的进化,既是国际体系秩序重组的产物,也是各种权力把控现实的能力增强的产物。而今天,软实力的式微在于,人们在各个场合所讨论的问题往往超出了其所能把控和解释的环节。特伦斯·鲍尔说,魏玛共和国之所以没能抵御纳粹,不仅是因为其政治上的软弱,更是因为其哲学“破产”。斯宾格勒说,西方的没落源于文化上的衰落。阿伦特担心的是“看不到希望的悲观”。哈贝马斯把这个问题描述为未完成的现代性。但是构建一个有效的公共对话能否真的实现更加清晰和准确的现代社会,至少在这次美国总统选举中我们还没有看清楚。而这个结果,其实是寻找一种更加明确和清晰的解释的开始。

制度的理想与文明的现实

其实从伍德罗·威尔逊时期开始,作为软实力代表的公共外交的兴起就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也是在现实主义研究者视野中,公共外交难以达到效果的原因之一。公共外交的成功,需要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国际环境、时间维度和技术条件的并行。

在 20 世纪,公共外交的兴起与两次世界大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共外交又赖于当时相互依存且相互制约的世界格局而存在。因此,国际环境在公共外交的兴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这种国际环境又注定了公共外交自身的功能主义限制。在整个冷战阶段,公共外交基本上是以理想主义服务于现实主义。这也就造成了在敌我势力均衡的环境下,公共外交活动比较活跃;在双方势力不均衡的情况下,不同国家更愿意选择时间成本较低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安全的最大化。这就是在“9·11”事件之后,尽管有公共外交的再度复兴,但是仍然有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的原因,公共外交不像冷战时期那样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优先手段。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 20 世纪上半叶,全球日渐期待一种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行为模式,来降低战争的风险和管控分歧。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公共外交的职能和角色也在发生更大的变化。

时间维度的变化,也是公共外交必须考虑的一个原因。公共外交是一场人心之战,或者按照美国公共外交委员会的话说,是改变观念、赢得和平的竞争,这就需要时间。公共外交不是一个短时间内能够看出效果的工作,而需要长期甚至是一代人的努力。从时间维度上看,公共外交能打造两种重要的意识。一是全球意识。由于公共外交建立在一个跨国家的对话语境中,行为体和对象的变化都需要一种稳定的对话语境,建立基于全球相互依存的意识基础是非常有必要的。事实上,冷战期间的公共外交,客观上也达到了这一效果。二是优势意识。由于全球信息流动的不平等,以及发展传播学所构建的“现代化憧憬”,公共外交的话语核心仍然是如何形成现代化优势。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公共外交中,还是存在着优势与劣势、先进与落后、工业化与非工业化、开放与封闭等多种形态的对立,这些对立构建了西方的优势意识。因此,在时间维度上考察公共外交,需要从这两个意识中寻找时间脉络。

技术条件的实现则更为人们所熟知。公共外交的形成,需要极为明确的传播载体,全球性媒体就是最重要的载体。但是在整个 20 世纪,全球性媒体进入了迅

猛的技术迭代与扩张阶段,其产生的技术升值速度,远远超过了之前 19 个世纪的总和。技术条件的变化为公共外交创造了更加直观的交流环境。无论是国际广播、卫星电视还是互联网,都改变了公共外交的时空,使得直播态、对话态的内容生产成为主流。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认为这些媒体技术的变化会给公共外交创造更好的交流机会,比如领导人可以更加直接主动地与公众交流,政府主导的各种信息活动能够在对象国公众中采集到更为准确的反馈,等等。这些固然都没有错,不过随着技术的发展,传播技术对公共外交的“绑架”也越发明显。例如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非国家的独立行为体可能在议题上深刻影响国际舆论,从而对公众起到议程设置甚至是舆论引导的作用,干扰不同国家的公共外交活动。比如维基解密的出现,就对美国的公共外交活动起到了制衡甚至是否定的作用。

公共外交的理想制度在于,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意识形态和观念将是这个构建过程中的重要手段。但现实主义者恰恰认为,实力的较量更加直观和明确,各国更应当依赖直观、短期和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在 21 世纪头十年,随着“9·11”事件带来全球反恐困局,尽管美国政府新任命了负责公共外交事务助理国务卿,但是同时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都出现了。这些都告诉我们,在实力此消彼长、不断变化的动态世界中,公共外交依然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公共外交的理论规制

因此,这本书所面对的问题,是在公共外交繁荣与全球化争论同时出现的历史进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对公共外交进行理论规制。从目前来看,公共外交的理论往往滞后于其活动本身,公共外交活动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利之间的跨国对话,实际上带有很强的秩序重构的色彩。

但是从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来看,对于公共外交的思考和研究仍然存在着“道”“术”之间的差异。多数研究者更重视公共外交在“术”的层面的意义,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外交能够发挥的作用,因此,主体范围在不断扩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外交研究的泛化,使得概念的外延不断模糊。而对于公共外交在“道”这个层面上的研究,则更多地被纳入不同的学科体系中。尽管每个学科都对公共外交有所认识,也在不断强调公众、舆论、媒体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研究路径的选择上,却往往绕开了这些问题,或者一笔带过。

如何重新选择公共外交的理论规制路径,可能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

的研讨。首先是公共外交的现代性意义如何构建。毋庸置疑,作为西方研究语境兴起的概念,公共外交本身承载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现代化的身影,人的主体性、对话结构、话语隐喻、信息自由流动这些概念直接或间接地投射在公共外交的研究中。冷战的结束使得这一进程被赋予了伟大的意义。但实际上,这种“伟大话语”自身也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如同 20 世纪 60 年代的伟大社会一样,自发地成了国际发展的一种模范。这个阶段的公共外交,给国家行为体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与公共对话的机会,也让人本主义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有了更明确的载体。因此,从更加深刻的意义上理解公共外交对于行为体和行为方式的变革,实际上帮助公共外交找到了更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理论来源。

其次是制度主义视野下的公共外交研究。传统的制度主义以国家组织和国家政治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的是官僚机构、宪法法律等正式的政治制度,是自现代国家出现起便占据主导的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而行为主义曾一度打破了这种研究构架。直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开始重新关注制度在公共领域以及个体行为中的作用,不同流派的新制度主义逐渐形成。新制度主义所研究的范围除了涵盖旧制度主义的国家正式组织与成文法规以外,也将制度的内涵延伸至非正式制度领域,如习俗、习惯等。公共外交的制度主义研究正是基于新制度主义,关切公共外交形成的制度背景、制度偏好,以及不同国家在公共外交制度构建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在这方面,当前国际学术界除了对于当代公共外交制度的形成进行梳理之外,如何对历史资料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挖掘,也是制度主义研究的根本问题。

最后是形成更加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模式研究。从主体到渠道再到效果,公共外交面对的最核心的技术问题就是:怎么说、说什么、对谁说、效果如何。这个世界上,既有奥巴马式的美国梦的代表,又有特朗普式的推特大嘴。而不同的言说者有不同的听众,也各有其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因此,在 21 世纪之后,学者们努力完成的一个工作,是探索不同政治体制、不同国际环境和不同舆论形态下公共外交的作用模式。这其中,既包括了制度模型,也包括了传播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何家营鼓乐社,还是维基解密,或者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都应该在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中国来说,公共外交固然是一个外来概念,但它却有着丰富的历史土壤。从历史上看,天朝中央概念和朝贡体制的对外关系思维,都使得中国学术界很容易理解公共外交这个概念的思维模式。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的怀柔和非战思想,都在影响着中国实行更倾向于理想主义的对外路线。从现

实中判断,我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理念,也推动了国家用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去解决一般性的争论或者冲突。2010年以来,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这就给了中国更加充分的条件去面对国家形象、政策解释和公众理解的挑战。比起传统意义上的对外宣传,公共外交更加重视传播的双向性,更重视倾听和反馈,也更重视对于噪声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公共外交研究,在中国当前的国际战略格局中,反而显得更有必要。即便在全球化出现纷争的时候,我们也愿意相信,对于公众认知的影响是长期的,各国越是面对多种矛盾,越需要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上,我们究竟是谁?”

因此,这本书与其说是回答了公共外交的一些问题,倒不如说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对于还在持续的全球化争论和不断深化的秩序变革,公共外交研究者如何自处,并如何形成理论规制,本书也愿意用有限的思考,求教于各位方家。

周庆安

2017年6月30日

目 录

第一章 从帝国到全球化 // 001

- 001 // 第一节 国家主体带来的身份变迁
007 // 第二节 传播技术带来的秩序变迁
016 // 第三节 公共外交的土壤和使命

第二章 公共外交的缘起 // 019

- 019 // 第一节 历史上的公共外交雏形
022 // 第二节 公共外交的正式确立
023 // 第三节 公共外交的定义
028 // 第四节 公共外交的归纳与分类
031 // 第五节 公共外交的三个前提条件

第三章 人心、渠道与软实力 // 037

- 038 // 第一节 追本溯源——软实力起源初探
046 // 第二节 当今软实力理论的几种变体
050 // 第三节 公共外交的研究维度

第四章 从制度想象到现实实践 // 058

- 059 // 第一节 冷战结束后战略转型中的公共外交研究
062 // 第二节 公共外交制度肇始与变迁：以美国为例
082 // 第三节 反恐时代的公共外交制度规划

第五章 当代公共外交的研究脉络 // 086

- 087 // 第一节 实践在兹的公共外交理论创新
094 // 第二节 反恐、文化与公共外交的多样化
111 // 第三节 反思与检讨：关于公共外交效果的几个观点

第六章 公共外交的模式变革 // 115

- 115 // 第一节 公共外交传播模式研究的可能
116 // 第二节 公共外交的基本传播模式
118 // 第三节 公共外交的宣传模式
125 // 第四节 战略传播模式的兴起
131 // 第五节 冷战结束后公共外交的五种传播模式

第七章 如何面对黑天鹅：修复模式 // 135

- 135 // 第一节 修复模式的传播目的
138 // 第二节 修复模式面临的公共外交挑战
139 // 第三节 修复模式的传播过程：从纽约世贸大楼到维基解密
144 // 第四节 修复模式中的次危机传播
146 // 第五节 社交媒体时代的修复模式

第八章 无处不在的媒介事件:构建模式 // 149

- 149//第一节 构建模式的传播学界定
- 150//第二节 构建模式的传播过程:国家性媒介事件的策划与公关
- 155//第三节 构建模式中的国家形象评估手段
- 158//第四节 国际活动与国家形象宣传广告
- 162//第五节 构建模式的局限性

第九章 教育与信仰的力量:影响模式 // 164

- 164//第一节 影响模式的传播目标
- 166//第二节 影响模式的传播内容
- 169//第三节 教育,从未缺席的公共外交
- 171//第四节 宗教,特殊形态的公共外交
- 173//第五节 城市文化承载的影响模式
- 175//第六节 影响模式的局限性

第十章 少数派报告:渗透与颠覆模式 // 177

- 177//第一节 公共外交的渗透模式
- 186//第二节 公共外交的颠覆模式

第十一章 公众舆论与技术变革 // 194

- 194//第一节 公共外交中的政府—媒体—公众关系
- 196//第二节 公共外交模式中的媒体角色
- 204//第三节 公众舆论对公共外交的影响
- 210//第四节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与公共外交研究
- 213//第五节 新媒体公共外交的反思
- 214//第六节 大数据在公共外交中的应用研究

第十二章 现代性与意识形态霸权

// 220

220	// 第一节	公共外交传播模式的启示
221	// 第二节	文化霸权与全球传播
226	// 第三节	全球公共领域与意识形态
229	// 第四节	公共外交与现代性的怯魅
234	// 第五节	寻找公共外交的有效性

第一章 从帝国到全球化

1897 年的塔西提岛,绝对是当时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另类。在这个孤独、安静、落后于当时世界发展水平的岛屿上,居住着一位直到 1903 年才令世人惊叹的法国画家——保罗·高更,而他的重要画作:四米长卷《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更成了这位画家在塔西提岛上完成的传奇之作。

提出问题的地点不重要,提出问题的时代可能也不重要,问题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对于当前全球化体系中的公共外交来说也同样如此。继 2016 年英国公投脱欧、2017 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职之后,针对全球化体系的问题和争议纷至沓来,其焦点都集中在全球化带给这个世界的成败得失上。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全球化过程中的新兴事物,自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实际上我们真正应该面对的问题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产物,公共外交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又会到哪里去?

第一节 国家主体带来的身份变迁

公共外交研究一直都有两种范式:一种是基于国际关系的研究范式,该范式从制度变革和权力变迁的角度关注公共外交的兴起;另一种则是从全球传播的角度关注公共外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于后者而言,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就是媒介载体。在四大传播领域——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中,开展最早的其实是有关人际传播的研究,但是今天成为最普遍研究对象的一般是大众传播。此外,组织传播具有明确的特殊性,因为组织传播常常与管理学相结合,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国际传播也一样,国际传播真正意义上的形成是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出现之后。所以国际传播常常面对三个问题,即国际传播的时空观、媒体观和主体观。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的延伸,一个人的手伸展开只有 80 公分到 100

公分,但是人的听觉、触觉、嗅觉、视觉会在媒介的帮助下不断发生变化,媒介给人提供了时间上的巨大变量和空间上的巨大延伸。我们第一时间知道今天波士顿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取决于我们的触觉或者嗅觉,而是取决于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所以,时空观念的变化是这几年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基础,也是今天公共外交的研究领域之一。举个例子来说,绝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来过中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形成对中国的看法,因为媒体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时空观念。但如果这个时空观念落后一点,落后到还认为中国人是留着辫子的民族,就说明这个时空观念没有及时更新。

国际传播的媒体观,往往决定了国际传播的传播效果。从有线电报的形成,到国际广播的普及,再到互联网成为国际传播的主角,20世纪国际传播的媒介技术变革,更进一步推动了国际传播行为的普及。例如从20世纪40年代冷战的出现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40多年的时间里,国际广播一直是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不仅是因为无线电波可以不受限制地跨越国界,更是因为无线电技术的稳定发展为更多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主要的载体。当然,在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互相限制和干扰无线电广播,也曾经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即便如此,国际广播仍然迅速成长,风卷残云般地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主要的传播工具。时至今日,人们往往觉得国际广播距离大多数人已经很遥远,但是国际广播带来的技术观念问题以及主权和国际传播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在新媒体领域中仍在不断出现。因此,国际传播研究中不仅出现了广播内容的研究,甚至延伸出了技术与安全、内容与安全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全球传播背景下的公共外交,首先建立在传播格局变化的基础上。从当年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描述的口头宣召士兵,到21世纪20年代的网络公共外交,或者公共外交2.0时代,实际上,公共外交工作构建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传播环境中。在公共外交研究中,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进行分析,离不开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即全球传播环境中的国家行为体变迁。

在公共外交的发展过程中,基本可见的是其发展结构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多个时间阶段同步。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公共外交处于雏形阶段。世界各国的统治者意识到,公众的力量在社会治理中是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力量,但是在统治思想中并未将这种力量作为一种独立成型的标志。而到目前为止,国家行为体仍然是从前现代社会演进到现代化格局中国际政治最核心的行为单位。这种变迁的根本逻辑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全球体系中的活动主体是否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从奴